

简说楚文化②

跌宕多姿的楚国历史(一)

楚国是周代的一个诸侯国。楚人立国之初,生存环境十分恶劣,北有中原诸侯的压迫,南有蛮夷部落的袭扰。面对种种困境,楚人秉持“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”的开拓精神,自强不息,积极进取,走出了一条融合夷夏、广纳百川的创新之路,最终将一个方圆不过百里的蕞尔小邦,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五千里疆域的泱泱大国。

第一节 楚族起源

楚族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华夏民族共同的始祖黄帝,其远祖是黄帝之孙颛顼的后裔;其直系祖先则是出自中原祝融部落的半姓季连。

一、高阳苗裔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楚世家》中记述楚族的来源时说:“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。高阳者,黄帝之孙,昌意之子也。”楚国诗人屈原在《离骚》中也曾说:“帝高阳之苗裔兮,朕皇考曰伯庸。”这就清楚地表明,楚人的始祖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共同祖先——黄帝,楚高族的先祖出自黄帝之孙颛顼。在中国古史传说中,颛顼与其工氏族战于不周之山,后又征服九黎氏族,继黄帝之后为帝,是中国上古“五帝”(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)之一,其活动范围在帝丘(今河南濮阳)一带,因此,楚族的发祥地最早可能是在中原地区。

在颛顼之后,楚人的多位先祖相继担任了火正这一重要职务。

火正的主要职责是观测天文星象,以授民时,即通过观测大火星(中国古代天文体系中的“心宿二”)确定季节,安排农业生产。由于楚人先祖们尽职尽责,不误农时,居功甚伟,被赐封“祝融”之号。“祝”有“大”的意思,“融”是“明”的意思,“祝融”的本义就是“伟大光明”。楚人的先祖重黎、吴回、陆终都曾担任过火正一职,他们都享有“祝融”的称号。火正的职司本来只是观象授时,并不主管人间的火事,但由于后世对于火正一职的理解出现了偏差,将掌管火种视为火正的职责,祝融因此被神化,成为受万民供奉的灶神与火神。

祝融后裔支系绵延,繁衍甚众,分化出八个不同姓的部落,即己、董、彭、秃、妘、曹、斟、半,史称“祝融八姓”。其中,半姓季连就是楚国公族的直系始祖。半姓季连部落最早生活在河南中部嵩山、新郑一带,夏末商初迁徙到地处中原的北楚丘(今河南滑县东)、南楚丘(今山东曹县东南)。

二、半姓支脉

商朝时期,季连部落与商朝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态势,时而交恶争战,时而友好联姻。早在商朝建立之初,就发生过成汤征伐季连部落的事件。在《竹书纪年》中,就有成汤“征荆,荆降”的记载。这里所说的“荆”,指的就是季连部落。及至商朝中期,双方关系渐趋和缓。在清华简《楚居》中记载有季连与盘庚之女妣佳结为夫妻的故事。

《楚居》开篇讲述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,大致意思是说:季连在一个叫方山的地方遇见了一个名叫妣佳的美丽姑娘,她是商王盘庚的女儿。季连对她一见钟情。当他得知妣佳已有婚后,依然矢志不渝地追求她。最终,季连以真情打动了妣佳,并得到了商王盘庚的首肯,迎娶妣佳为妻。妣佳后来为季连生了两个儿子。

《楚居》中所说的这位“季连”,自然不会是楚祖季连,而是商代中期季连部落的某一位首领。到商代中晚期之际,季连部落与商朝的关系再度恶化。在商王武丁统治时期,双方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争。

《诗经·商颂·殷武》反映了此次战争的情况,“挾彼股武,伐伐荆楚。深入其阻,哀荆之旅”。诗中所描绘的战争场面极为惨烈,武丁亲自统率大军,攻入季连部落的核心地带,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。商朝军队的不断攻伐,迫使季连部落不得不向西南方向迁徙。大约在商代晚期,季连部落迁到丹水流域,今陕西商洛、湖北丹江口至河南淅川一带。

第二节 辟在荆山

一、子事文王

商代末年,商纣王荒淫无度,众叛亲离,商王朝危机四伏。而此时,周族的首领西伯昌(即后来的周文王)广纳天下贤士,共同对付商纣王,周族势力逐渐强大起来。值此商朝衰微、周族方兴之时,季连部落的首领鬻熊审时度势,率部投奔了周文王。

鬻熊投靠周文王后,“子事文王”,也就是像儿子一样效忠周文王,深得周文王的信任,受聘为周文王的老师。

《史记·楚世家》记载楚武王熊通时说:“吾先鬻熊,文王之师也。”鬻熊不仅曾为文王之师,还担任过多位周朝初期君王的老师,周文王之后的周武王、周成王,都曾向鬻熊咨询国事。正因为如此,鬻熊受到后代楚人的顶礼膜拜,在楚墓出土的祭祷竹简文字中,楚人将老童、祝融、鬻熊作为“三楚先”一并祭祀。鬻熊和周王的一些重要对话,被史官记录下来,由后人汇集成为一本书,取名为《鬻子》。现今流传的《鬻子》残卷,保留了鬻子思想的片段与零星论述。尽管《鬻子》全书早已支离破碎,但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。

鬻熊之后,鬻熊继任为楚族首领,他领导部族开发了雎水上游的雎山地区,为后来楚国的创立奠定了

基础。根据清华简《楚居》的记载,鬻熊有两个儿子,一个叫“叔叔”,一个叫“丽季”,丽季也就是熊丽。熊丽的这一支后来发展成为楚国王族。清华简《楚居》中记载有一个故事,说明了楚人以“楚”为国名和族名的原因:《楚居》说:“丽不纵行,潢自助出,妣列宾于天,巫咸賤其助以楚,抵今日楚人。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,熊丽的母亲在生产时难产而死,巫师为了救出母腹中的胎儿,对熊丽的母亲实施了剖腹。

胎儿取出后,由于条件艰苦,巫师只找来一些荆条,将母亲受损的身体进行捆扎,然后安葬。在古代,“荆”和“楚”指的是同一种植物。自此以后,楚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母亲,将族名称为“楚”,后来受封建国时,也以“楚”为国名。

二、受封立国

鬻熊之后,熊丽、熊绎相继担任楚族首领,他们持续为周天子效命,不断稳固根基,壮大势力。楚人对周天子的忠诚最终得到了周王朝的认可,在周成王大封诸侯之时,楚族由原先的部落晋升为异姓诸侯国。

《史记·楚世家》记载:“熊绎当周成王之时,举文、武勤劳之后嗣,而封熊绎于楚蛮,封以子男之田,姓半氏,居丹阳。”周成王将楚人的原住地分封给楚人,正式加封国号。熊绎作为首位获得周天子正式册封的楚君,被授予子爵的爵位,成为周朝的一方诸侯。此后楚人正式以“楚”或“荆”为国号,翻开了楚国历史新篇章。

早期楚国的都城设立于丹阳。丹阳地处丹江北岸与淅水交汇处,其地应在今湖北丹江口与河南淅川交界处。丹阳作为楚文化的发祥地,是楚国不断走向辉煌的起点,在楚人心中具有神圣的地位。

楚国始封之时,国力微弱。熊绎在都城建了一座宗庙,用来祭祀先祖。宗庙建好后,却没有拿得出手的祭品来供奉先祖,楚人无奈之下,只得趁着夜色,到都国的地盘上偷了一头还没有长角的小牛,作为祭祀先祖的供品。因担心天亮后都国人前来索要小牛,楚人连夜将小牛宰杀,完成了祭祀仪式。此后,楚人祭祀先祖的传统仪式都在夜间举行。

熊绎受封之后,奉周天子,对周朝承担朝贡义务,参与周成王在岐阳召开的诸侯盟会。由于周王朝实施的“周之宗盟,异姓为后”的政策,楚国作为异姓诸侯国,遭遇了诸多不公与歧视。在岐阳盟会中,熊绎负责苞茅缩酒仪式,并与蛮夷酋长共同担任“守燎”之责,未获得参与签订盟约的资格。周王向齐、晋、鲁、卫等宗亲和姻亲诸侯国赐予珍宝,楚国也未能获得任何赏赐。

周王朝对楚人的不公待遇,激起了楚人自强不息、锐意进取的斗志。在熊绎的引领下,楚国臣民秉持着“筚路蓝缕”的坚韧精神,披荆斩棘,开辟山林,历经艰辛,共同书写了一部英勇奋斗的创业史。楚君熊绎以身作则,乘坐简陋的柴车,身着破旧的衣裳,深入草莽丛生、条件恶劣的山林之中,亲自开垦荒山,展现出非凡的领导力和创业精神。

三、分庭抗礼

楚国虽然遵循礼仪,向周王室进献贡品,以示臣服与尊重。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楚国的实力逐渐强大,周、楚之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。

到了周昭王时期,双方矛盾激化至顶点,周昭王对楚国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征讨。周军首次伐楚,因气象异常而被迫终止;第二次伐楚,周军在汉水遭遇了重大挫败,损失了六支精锐部队;第三次伐楚,周军更是遭遇了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,连周昭王本人也溺毙于汉水之中。此后,周王朝由盛而衰,楚国则日益发展壮大,逐步走上了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道路。

熊绎下传五代至熊渠时,周王室势力渐衰,导致诸侯间出现不遵天命、相互攻伐的乱象。楚国牢牢把握这一历史契机,积极向周边地域进行领土扩张。熊渠是一位颇有才干的国君,以其精湛的射箭技艺闻名遐迩。有一次,熊渠独自夜行,发现前方伏卧着一只老虎,于是张弓搭箭射向老虎,但却不见老虎动弹。等他上前查看时,才发现路上伏卧的并非一只老虎,而是一块形似老虎的巨石。由于熊渠全神贯注,用力过猛,箭矢嵌入巨石之中,一时难以拔出。成语“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”即来源于此。

熊渠敏锐地捕捉到了周王朝内外矛盾交织的契机,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,不断开疆拓土,使楚国的势力扩展至长江中游一带。熊渠凝聚江汉地区大小方国部落的力量,赢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,形成了“甚得江汉间民和”的局面。

在江汉流域站稳脚跟后,熊渠开始向周围扩张,他亲自率领军队东征,伐扬越(杨粤),势如破竹,最终成功将疆域扩展至鄂地(今湖北省鄂州市境内),并夺取了该地区丰富的铜矿资源。同时,他还向西发兵攻打庸国,向南则对长江中游一带的越人展开了攻势,进一步巩固并扩大了楚国的疆域和影响力。

在成功占领长江中游的广大区域后,熊渠公然与周朝形成对峙态势。楚人先祖熊绎在周初受封时只获得了地位不高的子爵爵位,熊渠对此愤愤不平,宣称“我蛮夷也,不与中国之号”,宣布不再接受周朝对楚国低等级的分封。

熊渠以天子自居,分别册封其三个儿子为王,将长子熊康封为句亶王,次子熊挚红封为鄂王,少子熊执疵封为越章王。至周厉王统治时期,周朝对楚国的压制日益加剧,熊渠为保存楚国实力,避免与周王朝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,他又主动撤销了对“三王”的分封,继续维持对周朝的臣服关系。

熊渠开拓江汉流域,奠定了后来楚国立足江汉、争霸中原的战略基础。从熊绎至熊渠的一百多年间,楚国由弱变强,逐步摆脱了周王室的束缚,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。

(未完待续)

文化荆州·城事

魂魄毅兮为云霓

——写在丙午清明前

□ 张卫平

烈士纪念碑,是有呼吸的!
这,是我在为荆州烈士陵园重撰纪念碑文,三易其稿时最真切的感觉。每一次落笔,都像是与长眠在这片热土上的英雄对话。仿佛,有一只无形之手,牵引着我,走进荆州红色历史的深处。

在接到为荆州烈士陵园重撰纪念碑文的任务后,我专程去瞻仰了烈士陵园。那天,我久久地立在高耸的纪念碑前,默默地、一个字、一个字的,在心中默念着碑文。在与纪念碑的对话中,我感到,夕阳映照下的烈士陵园,犹如一册即将打开的书卷,等待着唤醒沉睡的记忆、镌刻上庄重的文字。

“荆江浩渺,楚地风雄。这片浸润忠魂的土地,安葬着为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与国家建设捐躯的英烈。”开始,我在写作中,试图用一种宏阔的语调,为碑文定下庄严的基调。“其志坚若磐石,其德昭如日月,其功彪炳千秋。”这些对仗工整的文字,如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,沉稳而肃穆。

然而,读着读着,我想起了屈子行吟江畔时的诗句: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。”屈原,是荆州大地孕育的伟大诗人,他的那声叹息,穿越了2300多年,至今,仍在荆江涛声中回荡。初稿虽然庄严,但却少了一种屈子式的、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温度,少了那么一缕炊烟。

修改稿,是在一个雨夜里完成的。窗外,细雨如织,我摊开荆州党史,一页一页仔细地翻阅着。

渐渐的,那峥嵘的岁月,似乎从纸面上立了起来:秋收起义、年关暴动、焦山河会议、南平会师……荆州的每一寸土地,几乎都是先辈们用热血浇灌过。我的目光,久久停留在“焦山河”三个字上。1928年初,贺龙、周逸群、段德昌等人在焦山河召开紧急会议,作出了开辟洪湖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。上山与下湖,一字之差,成为了焦山河会议的焦点。那天,寒风凛冽,芦苇萧瑟,但就是在这看似寻常的江边小集镇,一颗红色的火种被郑重地埋进荆楚大地,燎原成湘鄂西最壮丽的火焰!于是,我写下了“革命热土,赤帜高扬”八个字。

我仿佛看见,1928年1月的荆江两岸,贺龙、周逸群、段德昌在凛冽的寒风中高举的义旗。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片土地上创造的“河湖港汉地带游击战争”。这,正是荆州儿女对中国革命战争形态最为独特的贡献。水网纵横、芦苇密布的洪湖,本是军事意义上的绝地,但一曲《洪湖水浪打浪》,唱出了这片土地上不屈的精神。

灯下,我继续翻阅着史料,沿着荆江一线,一寸一寸地走进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。

江陵沙岗,这个地名,读起来有点沙砾的粗粝与山岗的坚硬。1928年,沙岗成为江陵革命斗争的中心。白鹭湖畔的堤坝上,曾发生过多少次惊心动魄的战斗,多少沙岗儿女为保卫红色政权献出了生命。

石首调关,曾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枢纽。1929年,中共鄂西特委机关迁至调关,这里一度成为湘鄂西地区革命斗争的中心。调关的江面上,渔火与战火交替明灭,见证了多少壮烈与重逢。

公安南平,红二军团诞生地。1930年7月,贺龙、周逸群率红四军与段德昌、柳直荀所率红六军,在公安南平会师。两支铁流汇合,激荡出惊天动地的力量,书写出中国革命史上最具荆特色的篇章。

监利周老嘴,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版图上,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1931年至1932年,这里一度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政治、军事中心。那跳动的脉搏,即使过去了近百年,依然能在这片土地上感受到。

洪湖瞿家湾,更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与灵魂。一条不到300米长的老街,走出了多少开国的将帅……他们的名字,像星辰一样,镶嵌在中国革命的夜空之中。

红二方面军的摇篮!这是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最准确的概括。以红二军团为基础发展成立的红二方面军,被毛泽东称为“长征中的奇迹”。这奇迹的背后,是湘鄂西儿女的牺牲与奉献。有多少荆州子弟,从沙岗、调关、周老嘴、瞿家湾出发,跟随贺龙踏上长征路。又有多少人,永远倒在了雪山草地上。

这样的考虑,便让碑文的修改稿有了历史的体温,有了地名的重量,更有了时间的经纬。但是,我仍然觉得还不够。直到有一天,我读到杜甫的诗句:“戎马关山北,凭轩涕泗流。”那一刻,我便明白了。纪念碑文,其实需要的,不仅只是对史料的罗列,更需要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!要让每一个读到碑文的人,都能如杜甫一样,“凭轩涕泗流”。

于是,我决定,用数字和姓名来说话。

“一九二五年五月,荆州星火初燃。”具体的时间,让历史不再是模糊的背景。“柳直荀、崔琪等二十万英烈”之句中的柳直荀,毛泽东曾用“我失骄杨君失柳,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”的诗句缅怀他,而他的生命,永远定格在洪湖的芦苇荡中。同样年轻的湘鄂西省委书记崔琪,短暂的生命之火,犹如洪湖水中的萤火,短暂却明亮。

这些英烈的代表,不是抽象的符号。他们有一个父亲、丈夫、儿女的身份,还有未竟的理想、未了的心愿。就说柳直荀烈士的妻子李淑一吧,苦等了一生,等来的,却是丈夫早已牺牲的消息。毛泽东那句“我失骄杨君失柳”,写尽了革命者的儿女情长与家国情怀。

在修改定稿中,我特别写下了“宜沙战役”四个字。1949年7月,荆州全城解放。当年,我父亲也参加过解放沙市与荆州的战斗。他,很少提起那段往事,但我却记住了他说过的一句话:“攻城的那天,护城河的水都被鲜血染红了。”“战斗”的硝烟,已经散去了77年,当年的亲历者,也大多作古,而荆州,早已换了人间。

“烈士牺牲,岂止在战场!”我琢磨已久,用力在碑文中写下了“荆江分洪”与“抗洪壮举”。1952年兴建的荆江分洪工程,创造了中国水利史上的奇迹。在那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,30万军民,用一腔热血,在短短的70多天里,建成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。那些倒在建设工地上的英雄,他们的名字,同样应该被刻在纪念碑上。而1998年,荆州军民在特大洪水中筑起血肉长城。历年的抗洪斗争,同样是红色的篇章,同样是英烈精神的延续。

三稿三章,层层递进。初稿显得崇高却遥远,修改稿坚实却散乱,最后的定稿,则如紧紧攥着的拳头,每一个指节都充满了力量。

这,不仅仅只是文字的进化,而是心灵的沉潜。在重新撰写碑文的那段日子里,我一遍遍走进历史深处,一次次与那些英烈对话。那些年轻面孔的闪现,让我泪水涟涟。我知道,烈士纪念碑文,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堆砌,需要的,只是历史的重量和情感的密度。

“问讯吴刚何所有,吴刚捧出桂花酒。”在碑文定稿完成的那个月圆之夜,我又来到烈士陵园。月光如水,映照在即将镌刻新碑文的纪念碑上。突然,我想起屈原在《九歌·国殇》中的诗句:“身既死兮神以灵,魂魄毅兮为云霓。”

是啊!这些长眠在荆州大地上的英烈,他们的身躯虽然已经消逝,但他们的精神永存;他们的魂魄,刚毅勇武,化作了天上的云霓,永远地守护着这片土地。2300年前,屈原为楚国战死的将士写下这样的诗句;2300年后,荆州儿女用生命与热血续写着同样的悲壮。

“何日平胡虏,良人罢远征。”站在荆州烈士纪念碑前,我轻轻抚摸着那冰冷的耸立。唐代诗人李白《子夜吴歌·秋歌》中的诗句,是无数妻子对丈夫的期盼,也是无数儿女对和平的渴望。英烈们,正是用自己的“远征”,换来了后世的和平与安宁。

清明将至,碑文已经重铸。当春风吹过庄严的碑面时,我仿佛看见,烈士们的“魂魄”,在纪念碑上空浮现。于是,我举起右手,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!

文化荆州

二〇二六年第十四期 总第二百零五期

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

